

## 周恩来与邓小平经济伦理观比较

张 超<sup>1</sup>, 黄明理<sup>2</sup>

(1.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 淮安 223001;

2.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周恩来与邓小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点是人民利益决定论。他们认为, 为人民谋福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为此, 必须坚持生产中心论、效率与公平结合论和反对干部特殊化。

**关键词:** 周恩来; 邓小平; 经济伦理; 主体; 人民利益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 (2001) 05-0594-06

经济伦理常被人们视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 其实究其根本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伦理价值透视或对其所作的伦理评价。所谓经济伦理的主体观问题也就是经济利益的受体指向问题。周恩来与邓小平作为当年留法的同室好友, 前者曾总理国家大事 26 年, 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 尤其是以其崇高的道德品格而流芳后世; 后者曾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以其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而誉满世界。表象上看, 他们的成功各有其道, 而从经济伦理的视角看, 他们都是人民利益主体论的忠实代表者和践行者。比较研究他们的经济伦理主体论方面的思想, 是个新的尝试, 也许对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有所裨益。

《共产党宣言》曾明确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P.262)</sup> 因此, 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本位, 真实地反映和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的而非少数人的利益要求, 这正是基于经济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科学性和道义力量之所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 并以之最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基本的价值导向, 也是其根本的任务。

周恩来经济伦理主体观的主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 他非常强调要有“人民的立场”, 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sup>[2](P.65)</sup>。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 同周恩来一样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 在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的中央全会上, 他说: “我出来工作, 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个是做官, 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 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 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在他看来, 中国共产党员的任务可概括为两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他们之所以要坚持人民利益主体论, 其基本

收稿日期: 2001-02-20

作者简介: 张超 (1961-), 男, 江苏涟水人,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主要从事编辑学研究; 黄明理 (1961-), 男, 江苏盱眙人,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依据是极为相似的。首先,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周恩来在向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一再强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一个基本结论,人民的愿望成为党的纲领,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革命必须到本国人民需要时才会发生,而且只有本国人民起来实践奋斗,找出的革命道路才是可靠的。无产阶级领导人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什么事也做不成,这是一个真理<sup>[3](PP.515-516)</sup>。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sup>[4](PP.40-41)</sup>人民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渡过重重难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党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就是因为它是服务者。“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有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sup>[5](P.228)</sup>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他的思想里具体化为人民利益决定论。

其次,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使命所决定的。周恩来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sup>[2](P.132)</sup>。他在谈到改善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时说:“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忘记劳苦大众就是忘本<sup>[2](P.75)</sup>。同样,邓小平认为:“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sup>[6](P.228)</sup>

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利益本质上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满足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强调了人民利益的社会属性,它是人民利益得以最大限度满足的根本政治保证。离开了人民利益,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离开了社会主义,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周恩来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

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sup>[1](P.143)</sup>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体,也是其成果的唯一受体,“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或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sup>[2](P.142)</sup>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样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sup>[6](PP.264-265)</sup>

建国后的二三十年里,极“左”的指导思想仅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界说和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建成的是一个令人民不满乃至丧失信心的“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地将发展生产力并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sup>[6](PP.63-64)</sup>即便时代已步入思想极为解放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得出的这一论断也还是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反响。这表现出了他超人的理论勇气和睿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6](P.373)</sup>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其二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前者最终要体现在后者上。这

从邓小平确立三步走战略方针所使用的指标上可以得到清楚的确证。1990年,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也强调说:“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sup>[6](PP.354-355)</sup>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已被公认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理论贡献之一,而这一理论确立的价值标准就是人民利益决定论,也是对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目的论思想的发展。

## 二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的人民主体性不仅在其依据问题上基本一致和具有前后承接的关系,而且在如何体现人民主体性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后者继承与发展了前者。

第一,他们都坚持生产中心论。周恩来认识到,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克服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sup>[3](P.421)</sup>1961年,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这虽然仍有那个时代所难以免却的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印迹,但他注重和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生产中心论”思想却是一贯的,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期间,周恩来也未放松发展生产力,而是巧妙地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来保护生产力这一“中心”。笔者以为,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主张发展生产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守住了“民以食为天”的经济伦理底线:“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sup>[7](PP.23-25)</sup>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30年经验教训时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

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sup>[5](P.249)</sup>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与周恩来的生产中心论可谓一脉相承,所不同的仅在于前者蕴含着更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从而也更深刻和完备,同时也是对建国几十年来深切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怎样才能大力发展我国生产力?周恩来特别强调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sup>[8](P.303)</sup>,要“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sup>[2](P.350)</sup>。商业工作要正确运用价值规律。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对一味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极“左”倾向,周恩来认为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合作社“太大了不好搞”,还应“搞些个体生产”,因为我国农民有“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是有利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1957年,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以开办煤矿为例,明确提出了各行各业都“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构想。他说:“大煤矿国家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搞个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952年,周恩来针对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法行为明确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于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sup>[2](P.82)</sup>尽管他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在后来并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在那个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有如此精到的领悟确实难能可贵,这一思想为邓小平后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其二,重视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由周恩来率先提出的,而“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科技的现代化”<sup>[2](P.412)</sup>,没有科技现代化就不可能

有其它三个方面的现代化。

周恩来同志所强调的上述两条显然也为邓小平同志所特别关注，周恩来的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被升华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各项成功的经济改革无一不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周恩来的科学技术关键论思想被邓小平发展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第二，他们都坚持效率与公平结合论。在分配政策方面同样可以看出周恩来与邓小平人民主体论思想的渊源关系。周恩来于1954年提出“合理化第一，普及第一”的分配办法，主张公正与普及相结合。所谓“合理化第一”，就是要反对平均主义。他说：“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sup>[2](P.143)</sup>他对平均主义的实质和危害的揭示是相当深刻而经典的。这一论述为邓小平后来摒弃平均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所谓“普及第一”，就是要防止收入过分悬殊，注意社会公平。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发展平均主义”，又要保证不能只让“城市中一部分人，乃至城市中也是极少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造成悬殊太大。高级工资不要跟低级工资相差的倍数太多。这是我们工资中应该注意的”（《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又指出：“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兵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的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

在当时社会物质财富较为贫乏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尚高的情况下，周恩来坚持“两个第一”原则是符合国情，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平均主义意识深厚的思想传统的，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也是积极有效的。不过，很显然，“两个第一”是一个折衷性人道性的权宜之举，其中包含着二者不可两全的内在矛盾，与其

说它是辩证的两点论，毋宁说是更多地带有均衡论意味。因而它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科学而有效的分配政策。他虽然在理论上反对平均主义，但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实践上只能提倡低水平基础上的普及原则，无法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大众利益在发展基础上的充分满足的理想仍未能成为现实。

据笔者查阅，邓小平与周恩来一样，也是早在1954年就提出反对平均主义，他在谈到教师待遇时说：“将来工资的差距要拉大些，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些。”“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sup>[4](PP.210-211)</sup>1975年，邓小平对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平均主义提出质疑：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一样，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呢？<sup>[5](PP.30-31)</sup>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平均主义是表象的公平，实质的不公平，后果是鼓励懒汉，导致普遍贫穷。周恩来与邓小平反对平均主义的一个共同理论基点是，尊重人民群众个人的切身利益，并认为每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是劳动积极性的源泉，从而是必要和合理的（如他们都认为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与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反对平均主义所借助的理论更深刻，对其唾弃得更彻底，他对人民群众个体的物质利益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和普遍的伦理价值导向的层次上持肯定态度的。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sup>[5](P.146)</sup>他顺应民心，毅然给“富”“脱帽加冕”，认为人民“致富不是罪过”<sup>[6](P.172)</sup>。在他看来，是否能让广大人民富裕起来应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sup>[7](P.23)</sup>

同时，邓小平还找到了根绝平均主义和最大限度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sup>[5](P.152)</sup>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先富共富论中先富是实，共富是虚，关心了少数“精英”，遗忘了广大百姓。这是极大的误解。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sup>[6](P.143)</sup> 1986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sup>[6](P.143)</sup>

当然，事实上由于各人和各地方条件的差异，兼之多种所有制带来的多样分配方式，必然会带来富裕程度的不同，甚至会产生巨大的悬殊。在周恩来所处的时代，带有平均化色彩的普及原则使这一问题并未显现，因此，也就谈不上提出解决的方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贫富悬殊日渐显露，与全体人民共同致富的目标似有偏离，邓小平对此也有忧虑并设想了一个校正的办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

支持不发达地区。……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sup>[6](P.375)</sup> 概括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思考，他是把诚实劳动、按劳分配、示范效应、税收政策以及帮扶精神等视为由先富达到共富的几个主要杠杆。

从上述分析可知，周恩来的“合理化第一，普及第一”与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理论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最终归宿上都是基本一致的，合理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普及就是旨在人民大众皆能受益。二者的归旨都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要。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未能指出“两个第一”原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其实，二者之间确无内在联系），更找不出由此达彼的路径；而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理论则避免了这一不足，且鲜明地体现出了辩证的发展观。不过，应当承认，邓小平同志解决贫富过分悬殊的方法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对协调不同地区是灵验的，在微观的个人与个人层面上，上述几个杠杆往往只是软性的指导，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难找到一个技术性的真正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刚性调节手段。

第三，反对干部特殊化。干部特殊化不仅削弱了党的威信，而且又造成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在周恩来时代，干部特殊化现象并不严重，但也存在着少数特殊化现象，周恩来深刻地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说，中国的特点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sup>[2](P.231)</sup> 他在1963年所作的《反对官僚主义》报告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1980年，邓小平则列举出官僚主义的24种表现和危害<sup>[7](P.327)</sup>，其要害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核心是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改造，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邓小平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干部特殊化倾向极为严重，甚至发展到腐败的程度。他批评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

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sup>[5](P.260)</sup>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就是因为它是服务者。而现在党的威信减弱,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因此,“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sup>[5](P.368)</sup>应该说,上述警示是及时而到位的,反思是诚恳而深刻的。克服干部特殊化思想,严惩腐败,既是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号召力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必要政治条件。

如果说,周恩来与邓小平在经济伦理人民主体论思想方面有区别的话,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由于周总理作为毛泽东副手的特殊身份,以及他所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代,他的人民主体思想主要不是表现在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人民的个体衣食住行的关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使其一生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公仆,一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他对人民的关爱表现在无以计数的身体力行的个体行动上,这种爱民无我的奉献精神正是塑造周恩来高尚人格丰碑的根由。而邓小平则主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引导人民大众自己走上幸福之路。他反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因为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受到人民拥护的。它使人民的生活确实好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政策一变,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sup>[6](P.83)</sup>。

其二,在满足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还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周恩来时

代,人们对新旧社会的对比记忆犹新,对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政治热情尚高,还不存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已有了质的改善,然而,由于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手硬一手软,兼之,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不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人崇尚西化,主张资本主义私有化。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化必然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分析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sup>[6](P.64)</sup>他承认私有制一定能使少数人先富起来,但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他警告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sup>[6](P.229)</sup>所以,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sup>[6](P.143)</sup>。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周恩来大辞典[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王频.周恩来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特殊贡献[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1).
- [8] 刘泾山、时学军.周恩来的思维艺术[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下转第683页)

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并说自己“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可见在他的观念认识之中志怪已经不仅是鬼神之事，有些人事之奇亦已在其所志之列。实际情况亦是如此，在《夷坚志》中，凡生活中的奇事、奇人、奇性、奇情、奇术、奇案、奇气、奇物，都在其所志之列，“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夷坚乙志序》）。他用史书的手法编纂《夷坚志》，并强调有些故事还可以补国史，正因其纂述了人事。他在《夷坚乙志序》中还特别强调了《夷坚志》与以往志怪的不同，以往志怪小说“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虽然他指出了《夷坚志》也有虚幻特点，但他强调的是征实有据，来源可信，也说出了《夷坚志》近实，并无寄寓、接近人事的特点。这些表明了洪迈在认识与实际操作中拓展了“志怪”局限于鬼神释道的概念，已经开始向日常人情、人事之奇方面发展，不仅志“怪”，而且志“奇”，由怪异向奇特延伸。何异曾編集刻印过《夷坚志》的选

本，他说：“仆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于人事、资鉴戒而佐辩博、非《夷坚》所宜收者，别为一书，亦可得十卷。”（《容斋随笔序》）显然他囿于传统的志怪观念，认为《夷坚志》应“但谈鬼神之事”，不应收“不涉神怪，近于人事”的故事，这证明了当时人对洪迈将志怪拓展向人事之奇的不理解。明代凌濛初深受洪迈《夷坚志》的影响，在《二拍》中大量引《夷坚志》故事作为素材，其中许多就是《夷坚志》中表现人事之奇的作品，他在《拍案惊奇序》中这样说：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为奇，赘矣。

他将洪迈的观点发扬光大，将“奇”从仅指怪异荒诞，上升为特定含义的美学范畴。洪迈将志怪拓展及人事题材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杰出的贡献。

### On Hong Mai's View of Novels

ZHANG Zhu-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Hong Mai in South Song Dynasty had a firm belief in the value of novels, He wavered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of novels, doubting the existence of ghosts while believing in destiny. He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recording myth with fact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ales of Yijian. He enlarged the concept of myth with reference to strange events of human beings. His views of novels are both creative and conservative.

**Key words:** Song Dynasty; Hong Mai; novel; concept

责任编辑：张 强

(上接第 599 页)

### A Comparison between Zhou En-lai's and Deng Xiao-ping's Views of Economic Ethical Subjects

ZHANG Chao<sup>1</sup>, HUANG Ming-li<sup>2</sup>

(1.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concept of Zhou En-lai's and Deng Xiao-ping's views of economic ethical subjects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interest. Working for the interest of people, in their view, demonstrates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nd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ick to economy development as the heart of all work and combination of efficiency with fairness against cadre privileges.

**Key words:**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Economical Ethics; subject; people's interest

责任编辑：虞晓骏